

天鹅的歌唱

论俄罗斯作家

Tian E De Ge Chang Jia Lun Eruosi Zuojia

朱宪生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天鹅的歌唱

——论俄罗斯作家

朱宪生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 新登字 004 号

天鹅的歌唱

——论俄罗斯作家

朱宪生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4 插页 190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419—7215—0/I · 342

定 价: 18.0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厂址: 安康市香溪路 16 号 邮编: 725000 电话 (0915) 3213310

目 录

时代与个性

——对屠格涅夫创作的再认识和再思考 [1]

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形式问题 [25]

论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 [38]

天鹅的歌唱

——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散论 [55]

太阳星星月亮的对话 青铜黄金白银的交辉

——俄罗斯抒情诗史概论 [75]

俄罗斯诗歌的“青铜时期”和抒情序曲 [97]

论普希金的抒情诗 [114]

柯尔卓夫简论 [128]

俄罗斯心中不会把你遗忘

——《丘特切夫诗歌全集》译序 [150]

星星依然明亮

——费特的诗和诗艺 [176]

俄国社会问题小说的双璧

——从《谁之罪?》到《怎么办?》 [195]

曹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

——从《雷雨》谈起……………〔209〕

在“阶级”和“人”之间求索

——略谈高尔基的文学史观……………〔224〕

附录

幽会中的俄罗斯人

——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阿霞》读后思考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233〕

忆巴尔蒙特

——纪念他从事文学活动五十周年

……………〔俄〕玛·茨维塔耶娃〔259〕

后记……………〔275〕

时代与个性

——对屠格涅夫创作的再认识和再思考

(一)

屠格涅夫从事创作的上一世纪 40 年代至 70 年代,正是俄国的社会斗争和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黑暗统治,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封建农奴制的腐朽和崩溃,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这一切都促进社会矛盾的空前激烈化。农民问题在当时已成为“一切见解和谈话的惟一题目”(丰尔尼雪夫斯基语)。正像列宁所指出的,当时“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

屠格涅夫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对农奴制度极端不满,他立过“汉尼拔誓言”,宣布自己要与农奴制势不两立、斗争到底。后来他留学德国,接触到西方文明,成为“西欧派”。四五十年代,他作为一个受到时代感召的进步青年,在西欧启蒙思想的影响下,

特别是在他思想上的导师别林斯基的直接帮助下，在许多重大社会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都与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致或接近。但到 60 年代后，尤其是在 1861 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自上而下地“解放”农民后，他又逐渐与革命民主主义者分道扬镳，而对革命暴力的否定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的贵族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到了 70 年代，他对现实也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但他的思想始终没有逾越自由主义的樊篱。

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屠格涅夫主要是一个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并产生深远影响，除了他卓越的天才以外，与他按照时代的要求去接受文学传统有密切关系。屠格涅夫踏上文学道路之初，俄国文学正处于“果戈理时期”。40 年代，果戈理把普希金奠基的俄国现实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专制农奴制面临着崩溃的年代，“果戈理倾向”，即讽刺的现实主义，已成为当时“惟一强大而坚实的倾向”。

作为俄国现实主义的奠基人，普希金的创作中虽然也显示出一定的讽刺倾向，但就其创作个性的基本特质来说，毕竟与果戈理有较大的区别。普希金那极其丰富的诗人的感受力，总是善于投向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即使是对于平凡的事物，他都能努力地把它提到诗的境界中来，他“有一种把最平庸的事物变成诗的才能”，他注重人的感情的波动、心理的变化，却不大注意对客观环境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分析。果戈理却不是这样，他善于把“俄罗斯的全部丑恶集成一堆，同时来嘲笑这一切”，而很少把注意力投向美好的事物，他不大能写好正面人物，除了思想上的原因外，与他的创作个性关系极大。他注重社会关系的分析，却不大进行心理的探索，这也决定了他创作的讽刺和批判的倾向。

屠格涅夫就其个性来说，是极富于浪漫情调的，与普希金十分接近。对美好事物的敏锐感受，对心灵奥秘的深刻洞悉，对俄罗斯大自然深挚的爱，以及对不幸人们的强烈的同情，这些似都是与普希金相近的方面。但屠格涅夫的气质，似要比普希金更加忧郁；他的情感，没有普希金那样奔放、热烈，但却更为深沉；他不像普希金那样容易钟情，却要更为虔诚和执着；他不像普希金那样血气方刚，却要更为优柔寡断、温和善良。屠格涅夫一向崇拜普希金，把他视为“半神明的人物”，所以在屠格涅夫身上对于普希金传统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接受力。可是他所处的时代又是那样一个严峻的时代，而作为一个真诚的作家，主宰着那个时代的惟一强大而坚实的“果戈理倾向”又不能不对他发生重大影响。他一方面按照时代的要求，投入果戈理潮流之中；而另一方面，他又忠于自己执拗的个性，大量地吸取了普希金传统的精华。他的创作个性是在兼收并蓄前驱的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

然而作家的个性与时代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诚然，我们在屠格涅夫的创作实践中不止一次地看到时代的要求、时代的精神不断地吸引着他的注意力，驱使他去反映时代的生活，时代的洪炉也不断地锤炼着作家的个性。对此，学术界一直都十分重视。但如果我们是尊重客观实际的话，那我们也不应该回避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在屠格涅夫的创作史中，作家的个性一次又一次地顽强地挣脱时代的引力，从而使得他的创作一次又一次地转回到符合他的个性要求的创作轨道上来。

屠格涅夫的创作个性，就是这样在继承前驱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之上，沿着时代与个性两股作用力的合力方向，呈曲线状向前发展。

(二)

屠格涅夫早期的创作主要是诗歌。这一时期是他创作的探索时期，创作中呈现出 unstable 倾向。他模仿过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影响在他的诗歌中也很明显，但他的诗歌也十分鲜明地表露出他的个性和才华的特点。1843 年屠格涅夫出版了长诗《帕拉莎》，这是他的第一部大型作品。别林斯基很赞赏《帕拉莎》，认为《帕拉莎》“不仅是用优美的诗句写成的好诗，而且是贯穿了深刻思想、充实的内容，既有幽默、又有讽刺的好诗”。并认为它的作者是可能继承莱蒙托夫的少数人之一。《帕拉莎》是一部浪漫主义长诗，其中普希金的影响十分显著，但也可以发现果戈理的影响。别林斯基对长诗中的现实主义因素力加阐发，并作了高度评价。作为俄国现实主义批评的奠基人，别林斯基的这种评价在我们今天看来，与其说是对《帕拉莎》本身的客观评论，毋宁说是对《帕拉莎》的作者的一种鼓励。其实，《帕拉莎》所描写的不过是生活的一个小小插曲，并无很深厚的生活根基，它至多是暗示出当代生活的某些方面。别林斯基显然是有意想把他所欣赏的有才气的青年诗人引向“自然派”，鼓励他去描写当代生活，因而特别看重其中的现实主义的方面。后来别林斯基也认为他当时对《帕拉莎》的评价是过高了。屠格涅夫后来又写了一部浪漫主义长诗《交谈》，别林斯基也对长诗力图反映当代青年的思想特征这一点表示过赞扬。就这样，屠格涅夫在别林斯基的指引下，逐渐向现实主义靠近。1846 年，带有明显的“自然派”色彩的长诗《地主》问世，这是屠格涅夫走向现实主义道路的第一部大型作品，就其

题材和风格来说，与后来的《猎人笔记》是一脉相承的。《地主》发表后，遭到反动阵营的指责，但别林斯基捍卫和高度评价了这部作品，认为它是一幅当代地主生活的风俗画。看来，屠格涅夫似乎沿着果戈理开辟的那条路走下去了，而这也正是别林斯基寄希望于他的。可是，就在同一年，屠格涅夫又写作了另一部浪漫主义长诗《安德烈》，它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无论从题材还是从风格看，都与《地主》差异很大，并且，它比《帕拉莎》离果戈理倾向更远。安德烈这个人物，在许多方面令人想起《阿霞》中的恩先生、《贵族之家》中的拉甫列茨基和《烟》中的李特维诺夫来。如果说屠格涅夫善于创造那种感情真诚、心地高尚、善良但性格软弱的男子的话，那么安德烈是这类人中的第一个，其他人物可以说是在安德烈这样一个雏形上发展而成的，正像他笔下那些动人的少女与帕拉莎都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一样。除了主人公是青年诗人所心爱的人物外，《安德烈》在艺术上也十分明显地体现出屠格涅夫的个性特点，淡淡的悲哀、浓郁的抒情，对心理活动的注重和着力渲染，还有哲理的思考等，这些在后来都发展成为所谓“屠格涅夫式的风格”的重要方面。

别林斯基对《安德烈》的评价是否定的。批评家认为《安德烈》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因为这是一部恋爱小说”。他甚至还认为“描写爱情并不是作者天才份内的事”。在“尼古拉的黑暗”中，在农奴制已成为全社会瞩目的首要问题的时刻，作为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和批评家，别林斯基是把文学作品的社会性、现实性看得高于一切的，他正是根据这一标准对《安德烈》作出了上述评价，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屠格涅夫即使是在自己尊敬的导师直接帮助和热情鼓励下，

仍禁不住要走向他自己所喜欢的题材和人物，仍抑制不住自己的个性在创作中的自然流露。今天我们从屠格涅夫的全部创作来看，别林斯基的“描写爱情并不是作者天才份内的事”的断语显然是不够正确的。后来别林斯基的继承者之一杜勃罗留波夫就高度赞扬了屠格涅夫对爱情的出色描写，称他为“理想的女性之爱的歌唱家”。当然，别林斯基活得太短，他在1848年就离开了人世，他甚至还没有见过屠格涅夫的比较重要的作品，如果他能活得稍长一些，也许会纠正自己的论断的。但从《帕拉莎》到《地主》的发展，又从《地主》到《安德烈》的回转当中，看到了作家的个性对于时代和为时代所要求的传统的作用力的冲击。屠格涅夫创作个性的形成和发展的轨迹中第一次出现了靠近个性作用力方向的趋势。

(三)

《安德烈》遭到否定，屠格涅夫有点儿气馁，他甚至对自己的才能失去了信心，打算放弃文学创作。就在这一年年底，他把一篇题为《霍尔与卡里内奇》的特写交给《现代人》杂志，后便启程去了巴黎。当时他对这篇东西并未抱多大希望，甚至还打算以它来告别文学界。1847年《现代人》第一期发表了《霍尔》（以下都简称为《霍尔》），编者还为它加了个副标题“摘自猎人笔记”。作品一发表，便获得巨大成功，读者纷纷给编辑部来信，询问“猎人笔记”下一篇何时刊出，这是屠格涅夫始料不及的。《霍尔》的成功鼓舞和促使屠格涅夫一连写了二十余篇这样的特写，这便是后来结集出版的著名的《猎人笔记》。别林斯基读了《霍尔》后，立即给屠格涅夫写信：“根据《霍尔》来

判断，您的前途无量，这是您的文学形式，《霍尔》为您成为未来的卓越作家指明了方向。”别林斯基对这一时期的屠格涅夫是满意的，他高兴地看到这位有才华的青年作家沿着他指出的现实主义道路迈出了一大步。

《霍尔》的成功，除了作家的才华外，看来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为什么他以前得不到这样的成功呢？难道他以前就没有才华吗？显然不是。《霍尔》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屠格涅夫把他的笔转向了时代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上（这在他也许是不自觉的），并以新的角度描写了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而这正是别林斯基寄希望于他的，也是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接受时代感召的结果。与此相联系，他在艺术上也主要是继承果戈理的传统，用他的艺术描写和“自己的形式”对农奴制进行了讽刺和揭露。这里，时代的引力战胜了作家个性的张力，他的成功，与其说是才华所致，不如说时代要求与艺术方法的使然。不过，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个性仍发生了一定作用，《猎人笔记》除了对地主的讽刺和揭露外（这种讽刺与揭露与果戈理的激烈的抨击和批判是有差别的），另一显著之点就是作家以充满诗意的笔触描绘了大自然，并在这一背景上赞美了农民的精神美和创造才能，这种描写在当时文坛上具有独创的意义，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别林斯基认为屠格涅夫是“从他以前任何人都没有这样接近过的角度接近了人民”。

《猎人笔记》给屠格涅夫带来了巨大的文学声誉，屠格涅夫一跃成为全俄罗斯所瞩目的作家了。成功自然给他带来喜悦，然而他似乎还感到某种不满足。下一步打算怎么走呢？看来他常常思索着这个问题。就在《猎人笔记》单行本问世后的两个月，他在写给安年科夫的信中说：“需要走另一条路，需要找到它，

并同旧的风格永远绝交。”后来他又对冈察洛夫这样说：“我总不能无穷无尽地重复《猎人笔记》吧！”1855年，针对当时文学界关于普希金影响和果戈理影响的争论，屠格涅夫在给德鲁日宁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两种影响对我们都需要，普希金的影响退居第二位了，——可以让它重居第一位，但决不能让它来代替果戈理影响。”他深知自己的成名之作便是果戈理影响的结果，但他在个性上、感情上更接近普希金，他需要按照自己的个性要求用他所喜爱的风格和方式去抒写他所熟悉的心爱的人物。这里，作家的个性又一次挣脱时代的引力，转移到自己的轨道上来。

他的目光渐渐地离开了农民，他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那些他所熟悉的人物和在他心灵上留下深深痕迹的往事浮现在他的眼前：莫斯科大学的哲学小组、斯坦凯维奇和巴枯宁、对托尔斯泰娅的眷恋、与平民女子阿芙多吉娅的一段私情、痴情的巴枯宁娜，更还有对维亚尔多夫人执着的友情，以及青年时代许许多多的感受，这一切都滔滔不绝地涌向作家的笔端。于是我们便看到了《书简》、《罗亭》、《浮士德》、《阿霞》、《贵族之家》等一系列作品的相继问世。它们的主人公都是屠格涅夫心爱的或熟悉的人物，甚至常常是作家本人。作品的风格也与《猎人笔记》迥然不同，忧郁、淡淡的悲哀、抒情气息、哲学的沉思充溢于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就主要特征来说，这种风格虽与普希金的相接近，但显然又不是普希金的风格，这是屠格涅夫自己的风格。而果戈理的影响已退居到次要地位，并且已被作家的个性所改造，成为一种淡淡的含蓄的讽刺。

国内外学术界常常把这一系列作品中的《罗亭》和《贵族之家》（特别是前者）与前一时期的《猎人笔记》（自然也与后

来的《前夜》和《父与子》）视为同一类作品，这也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从这两部作品的客观效果来看，它们确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内容，这一点与《猎人笔记》鲜明的社会性是一致的。但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类作品不但在题材上与《猎人笔记》完全不同，而且在艺术上也差异很大。在这些作品中，有屠格涅夫心爱的男男女女，他们之中有最初出现于《安德烈》之中的那种类型的男子：正直、善良、软弱；也有像帕拉莎一样深情、纯洁、勇敢的少女。这些作品无一不写到爱情，像娜达丽娅与罗亭、丽莎与拉甫列茨基、维拉与巴维尔、阿霞与恩先生等等，软弱的男子在坚强勇敢的女性面前常常退却，人们常把这看成是屠格涅夫检验“多余人”的拿手技法，然而作家自己是否这样认为，那恐怕还未见得。但文学作品的客观的艺术描写常常越出作家本人的主观意图，这也不是罕见的文学现象。可是，在这些作品中，这种“客观大于主观”的情形，也绝非没有差别。《罗亭》就比较突出，《贵族之家》次之，《阿霞》便不大明显，至于《浮士德》、《寂静》、《波列谢之行》和《初恋》就更加朦胧了。也许就是这种差异造成了人们对《罗亭》等作品的不同认识和评价。对于这些作品，我们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既要充分肯定那种“客观效果”，又不能去拔高它。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年所谓“纯艺术论者”力图把屠格涅夫拉入他们的营垒，20年代苏联也有人认为屠格涅夫抒写的是“爱情、人世的悲哀、淡淡的哀愁……”，大都是以这类作品（甚至也包括《贵族之家》）作为依据。这也说明这类作品在题材上确有自己的显著的特点。

但没有异议的是，这些作品表现出来的艺术风格是成熟的屠格涅夫自己的风格了。关于屠格涅夫创作在艺术风格上的特

点，是另一个问题，且有专文论及，这里不再赘述，仅列举同时代人的一些评价作些补充。皮萨列夫十分赞赏《贵族之家》，认为它是屠格涅夫创作中“最严整最完美的一部作品”。涅克拉索夫曾多次对这些作品发出赞叹，在读了几部这样的中篇后，涅克拉索夫写信给屠格涅夫说：“《浮士德》的确不差。《雅可夫·巴什科夫》中的全部和《三次相逢》中的许多篇章我也很喜欢。它们的格调很动人……”这位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感叹着：“……您自己不知道，只要能用爱情、痛苦和任何一种理想去拨那根同您那颗心儿一样跳动着的心弦，它就会发生怎样的声音来啊……”《阿霞》就是屠格涅夫按照涅克拉索夫的要求写成的。对于这部作品，涅克拉索夫和《现代人》杂志的同人都赞叹不已，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涅克拉索夫写道：“它散发着真诚的青春的气息，整部小说才气横溢，犹如一块纯金，整个优美的环境同它富有诗意的情节都非常协调，一点也不勉强，无论从美或纯的角度，都是我们的空前之作，甚至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个中篇也感到由衷的高兴。”

颇有意思的是，就像当年别林斯基对《帕拉莎》发出赞赏一样，别林斯基的继承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阿霞》发表时也高度评价了它，为它写了一篇在俄国批评史上占有很高地位的论文《幽会中的俄罗斯人》。批评家把《阿霞》称为当时文坛上的“几乎是惟一的优秀之作”，他特别赞赏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诗意。也像别林斯基对《帕拉莎》中的现实主义因素着意阐发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联系迫切的社会问题深入地挖掘《阿霞》的政治的社会的意义。可是屠格涅夫再也不是40年代的屠格涅夫了，那时，他作为一个进步青年和刚刚踏上文学之路的青年诗人，能够合上时代前进的脚步，能够遵循别林斯基的指

教，主动地向当代生活靠拢，尽管有时也禁不住自己个性的力量。而现在，在专制农奴制面临全面崩溃的前夜，作为一个贵族自由主义者和享有全俄罗斯声誉的作家，他的思想矛盾开始暴露出来，他的艺术见解也与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不无分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引起他的不满，他似乎不肯承认他的作品竟会包含有如此激烈、深厚的社会内容，正如他后来害怕杜勃罗留波夫在评论他的《前夜》的名文中所引伸出来的革命思想一样。

可是，不管屠格涅夫这时的思想怎样开始趋于保守，农奴制改革前后急剧的动荡的社会潮流仍不可避免地把他卷了进去，于是我们在他的创作中又看到了一次转折，一次在更高的阶段上类似于从《安德烈》向《猎人笔记》的转折，而就其实质来看，这又是时代的作用力向作家的个性发动的一次更有力的冲击。

(四)

1858年，在《幽会中的俄罗斯人》一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评述了《阿霞》中的男主人公这个“多余人”后这样写道：“我们感到，我们处在他的影响下已经不会很长久了。有些人要比他更优秀，这就是被他欺侮的人……”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从严峻的现实生活出发，指出“多余人”的时代即将结束，代替他们的是一些新的人物，是被他“欺侮的人”，这显然是指平民知识分子。但在批评家看来，这样的人物在生活中还很少，而他们要出现在文学中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他也承认“在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适应这种思想”。

然而，作为作家的屠格涅夫，却老早就从生活中捕捉到这样的人物，并且把这样的人物带进文学的念头也时常在他脑中闪现，而在1855年他又在一本偶然得到的笔记本中更明确地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主人公。可是，他一时还不能着手这件事。那时，他正沉浸在那些往事的“回忆”之中，只有等到他还清了过去的债后，也就是说等到他完成了《罗亭》、《贵族之家》及一系列回忆式的中短篇后，他才能把注意力转到当代生活方面来。然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改革”前夜急剧变化和发展的社会生活促进了他创作中出现新的变化，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完成得要比前两部迅速得多。

1860年1月，《现代人》杂志刊出屠格涅夫的著名论文《哈姆雷特和堂吉珂德》，这篇论文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创作中出现的新变化。屠格涅夫把文学史上两个著名的文学典型进行分析比较，他是把哈姆雷特和堂吉珂德这两个典型性格作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人性来认识的，而且他还认为“所有人多多少少属于其中一种类型”。屠格涅夫批评了哈姆雷特式的怀疑主义、软弱性格和消极的人生态度，他似乎是以此对他过去作品中的主人公作一个总结。他高度赞扬了堂吉珂德对理想的忠诚和自我牺牲精神，他感叹道：“要是这样的人绝了迹，那就得把历史书永远合上了，那里面没有什么可读了。”他这番话不仅仅是对文学史上这个著名的典型而发的，他显然是在生活中发现了这种坚强的、具有为理想而献身精神的人物。这篇论文为他创作中的新变化带来了信息。

几乎是在这篇论文发表的同时，长篇小说《前夜》问世了。屠格涅夫写道：“我给这篇中篇小说（即《前夜》——引者）定这样一个名称是因为我考虑到它出现的时代，那时，俄罗斯开